

# 转轨时期中国农业 经济组织的演进

曹利群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轨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组织的演进/曹利群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10

ISBN 7-5043-4378-1

I. 转… II. 曹… III. 农业经济—经济组织—研究—中国  
IV. F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 103661 号

### 转轨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组织的演进

作 者	曹利群
责任编辑	王振令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
监 印	陈晓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三条 9 号(邮政编码: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73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378-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本书摘要

本书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组织演进的历史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发现主流的制度变迁理论存在着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最后尝试性地指出了它的发展方向。

本书首先区分了组织与制度两个概念,然后综述了古典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巴纳德、西蒙、新制度经济学等关于组织及其演进的研究,试图挖掘出制度变迁理论中有关组织及其演进的研究内容。对威廉姆森的综述试图说明套用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研究组织及其演进问题可能引发的逻辑矛盾;综述诺斯则是通过刻画其研究工作的转型来说明如何克服此逻辑矛盾。

本书遵照历史的顺序展开论证的逻辑。第三章的研究揭示,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仅仅是效率问题导致的,而是和当时政治域的博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旧组织的更替可以用纳什均衡的达成和瓦解加以解释,只有当农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同时采取行动时,新的组织才能够得以生成。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内部不同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博弈对于农村经济组织演进存在着决定性的影响。并且,由于人民公社体制和统派购制度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统派购制度自然瓦解,从而为市场的发育创造了空间。

承包制推行之后,传统农业经济组织体系——包括供销合作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技推广组织等——仍然滞留在行政组织体系内部,不能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服务,“统一经营”名存实亡,难以形成一套合理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无法顺利衔接,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徘徊不前。

与此同时,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扩展推动了专业化和在此基

基础上的再组织。农户、企业等面对市场艰难地开始了再组织,各种各样的组织创新应运而生,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农村经济联合体、90 年代之后出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农户”、“公司+农户”等。这些组织不仅是现有制度环境下的产物,而且,其经营明显地受到界定其组织性质的制度的制约。通过适当地修改这些制度,同时通过维持合作社的社区性而引入社会资本的作用,合作社具有自身的优势。对“公司+农户”的研究则揭示出,不同类型的组织嵌入在不同的制度结构当中,离开制度背景比较单个组织的效率不具有任何意义。

在解释历史的基础上,本书试图得出对主流制度变迁理论的启示:社会变迁往往是结构的变迁,制度变迁和组织演进同为结构变迁的两个方面;制度变迁并不简单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个体行为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不能简单地用交易成本标准标示制度变迁的方向,单纯的效率标准需要改进。

为了行文的紧凑,本书把一些有关的研究放在附录当中,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之前的有关研究、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有关农民理性问题的争论以及对个体行为的数理表达、新古典理性假定和传统制度变迁理论的冲突等内容。

**关键词:** 农业经济组织 演进 演进结构主义 博弈

**说明:** 本书采用文中注和页下注,其中文中注的形式如:“诺斯(1997, p17)”,读者可在参考文献中按作者音序找到诺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华夏出版社,1997 年),标注说明该处观点引自此书的第 17 页。本书引用的标注方法、含义及索引与之相同。由于引文较多,书后只列出了大部分文献。

# 目 录

<b>第一章 导 论</b>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思路 .....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农业经济组织的含义 ..	(10)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 .....	(27)
<b>第二章 理论综述</b> .....	(36)
第一节 威廉姆森对组织及其演进的研究 .....	(36)
第二节 诺斯对组织及其演进的研究 .....	(49)
第三节 有关转轨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组织 演进的研究 .....	(66)
<b>第三章 人民公社的解体:转轨时期农业经济     组织演进的开端</b> .....	(74)
第一节 前人的研究和本文的认识 .....	(74)
第二节 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 .....	(82)
<b>第四章 农产品市场的扩展和传统农业     组织体系转型的滞后</b> .....	(91)
第一节 统派购制度的解体 and 市场的形成 .....	(91)
第二节 传统农业经济组织体系转轨的滞后 .....	(98)
<b>第五章 新兴组织体系的发育( I ):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市场+农户”</b> .....	(116)
第一节 组织体系重构:命题的提出 .....	(116)
第二节 农民合作组织的现状和发展 .....	(132)
第三节 “市场+农户”: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 .....	(151)

<b>第六章</b>	<b>新兴组织体系的发育(Ⅱ):“公司+农户”</b>	(162)
第一节	“公司+农户”: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含义	(163)
第二节	“公司+市场+农户”研究	(168)
第三节	“公司+基地+农户”研究	(172)
第四节	“公司+合作社+农户”研究	(176)
<b>第七章</b>	<b>传统组织体系的转型及其与新型组织体系的对接</b>	(184)
第一节	传统组织体系的转型	(184)
第二节	“复归农门”:乡镇企业的转轨	(193)
第三节	两类组织资源的对接——以农资环节重组为例	(204)
<b>第八章</b>	<b>中国农业组织演进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启示</b>	(209)
第一节	启示一:结构变迁非制度变迁	(209)
第二节	启示二:个体行为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	(221)
第三节	启示三:单纯的效率标准难以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	(228)
<b>附录一</b>	<b>新制度经济学之前有关组织及其演进的研究</b>	(237)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对于组织问题的研究	(237)
第二节	经济学的转向和管理学的研究	(243)
第三节	巴纳德和西蒙的先驱性研究	(248)
第四节	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258)
<b>附录二</b>	<b>结构主义的演进</b>	(264)
第一节	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结构对个体的约束	(264)
第二节	早期结构主义的缺陷	(267)
第三节	结构主义的发展之一:对个体的重视	(270)
第四节	结构主义的发展之二:进化论思想的引入	(274)
第五节	对结构主义后期发展的评价	(277)

附录三	关于农民理性的有关争论及其模型表达·····	(279)
第一节	有关农民理性的争论·····	(279)
第二节	个体行为的设定和数理表达·····	(284)
附录四	新古典理性假定与传统制度变迁理论的冲突·····	(299)
主要参考文献	·····	(312)
后 记	·····	(324)



# 第一章 导 论

组织演进是近 20 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线索,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本章认真界定了农业组织的内涵和外延,详细阐述了研究问题的视角、全文的逻辑构架以及研究的不足和创新。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思路

1978 年以来我国农业经济组织演进的过程波澜壮阔,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独具特色,它为我们检验和深化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理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把握农业组织演进的方向,是当前我国农村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按照 1978 年以来农业组织演进的顺序依次展开论述。

### 一、问题的提出:组织演进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本研究同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解决农业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农业组织体系的重构是现阶段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理论上的角度来看,1978 年以来中国农业组织演进为我们理解组织的演变、制度的变迁、经济的转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借此对制度变迁理论、转轨经济学等理论进行检验。

#### (一)推动农业发展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

础,一直为工业化贡献着劳动力、工业原料和工业品市场(加塔克,1977)。<sup>①</sup>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达到8.68亿,占总人口数的70.8%,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50%左右。<sup>②</sup>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被人为地割裂,稍有不慎,农村问题极有可能构成对现代化进程的拖累。拉美等国家的前车之鉴非常值得我们反思。时代对农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重大而深远的挑战,与之相比,理论的研究却显得如此单薄,如此与时代不相合拍。<sup>③</sup>

毫无疑问,旺盛的需求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消费占到全部需求的60%以上。作为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成果,近几年国民经济终于走出了“短缺”的阴影。需求对国民经济的制约立刻凸现<sup>④</sup>,如何拉动需求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口占到70%左右,但他们的消费需求却只占社会消费总额的42.4%。即便如此,这还包括了农民的实物消费。如果将实物消费加以剔除,该比重估计在30%以下。

---

① 这是一种较为过时的观点,认为农业的作用仅限于为现代化提供支持,并不需要为农业现代化作出政策努力,因为这个部门是要自然衰落的。有关农业作用的历史争论,参见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p519~523,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力量集中在一些“后现代”的命题,如金融工程、高科技融资等。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与它们相比,农业问题的研究远为滞后。从每年经济学博士论文和发表的经济学期刊文章观察,就能够简单地发现这一点。在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农业经济研究一直难登大雅之堂。我的导师周立群教授试图改变这一点,大力推动南开大学的农业问题研究。

④ 由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的市场预测表明:今年商品市场依然供大于求,在609种主要商品中,仅有蓝狐皮、水貂皮、紫貂皮、改良羊毛等4种商品短缺,今年上半年供大于求的商品将比去年下半年增加6.9%。

2003年农村居民总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9.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2399元，仅占城镇居民的29.0%；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基本上和10年前城镇居民相同；县及县以下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连年下滑，1991年为52.0%，之后一路下跌，1996年为39.6%，2003年仅为35.0%，农村居民消费不振，将拖累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sup>①</sup>

目前拉动消费需求的重点仍然停留在城镇居民。但见效甚微，政府不得不转向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试图依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sup>②</sup>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政府支配资金规模过大，压缩了民间投资的空间，甚至导致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倒退。<sup>③</sup>

与此同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全国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全社会42.4%的财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sup>④</sup>“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由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近几年来一

---

① 数据来源：农业部，2003 中国农业报告，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林毅夫等人认为，依靠农村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就是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不少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林毅夫：“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论坛（一）、（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第74期和75期（2000年10月23日）。

②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过去几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一是导致政府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二是投资的效率值得怀疑，三是存在着一定的“挤出效应”。长远观之，还是必须寄希望于民间投资、继而消费需求的生长。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向来是考虑短期效果的，短期的繁荣并不等于长期的增长。

③ 参见袁钢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重大调整”，《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28日。这是我作为该报特约记者采写的。

④ 中国基尼系数各年的走势如下：1980年：0.33；1988年：0.382；1996年：0.425；1998年：0.456。这方面的争论很多，我们无意、也无能力对此作出更多的评论。指出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可：城乡收入的差距构成了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

些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出现了绝对的下降。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23:1左右,如果考虑到农村居民收入中含有实物折算收入和部分生产经营费用,实际差距更大,估计在6:1左右。<sup>①</sup>分配不均已成为影响扩大内需和城乡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它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 (二)组织演进是现阶段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存在着一套完整的、功能健全的组织体系。人民公社居于产中环节,辖农机站、农技站、畜牧站、水利站等机构。产前的主要组织是农业局(种子站)、畜牧局、林业局等。供销社、粮站、商业局等部门负责产后的加工、收购。产前、产中、产后的所有组织由政治权力、而非市场价格进行协调。这套组织体系同时履行着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职能。应该说,计划经济的农业组织体系较好地推动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较好地为工业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林毅夫,1992;林毅夫等,1994)。

然而,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较为低下。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农业产出高速增长的事实掩盖了农业组织体系重建的问题。1984年之后,农产品市场化的改革一步一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建设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体系,新兴组织体系至今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尚未发育成长。新的组织体系尚未成形,旧的体系已经瘫痪,农业组织急需重建。农业组织发育的滞后严重地制约了农产品的销售、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市场的建设、农业技术的进步<sup>②</sup>,继而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拖累了中国经济的顺

---

<sup>①</sup> 邱晓华等:“正视现实,反思差异——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初步分析”,《调研世界》,2000年第10期。

<sup>②</sup> 笔者在初期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

利转轨。<sup>①</sup>

(三) 中国农业组织演进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主要是建筑在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分析之上的。与此相比,中国社会制度环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多元所有制)及改革道路的错综复杂(渐变、多层次、多方位、混合所有制)都独具特色。中国农业组织演进的道路艰难而又极具代表性,它为新的理论研究和新的理论突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中国制度变迁规模之庞大与程度之深刻都是当代世界舞台上罕见的。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革命后虽然政府频换,亦经历了世界大战、多边战争、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的冲击,但总的来说,西方社会是在相对平和的市场经济的渐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大多数理论模式着重于对市场社会的静态分析。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变迁对已有的理论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中国的改革经历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更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转轨国家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着实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转轨国家的经历为理解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如罗兰(2002,6页)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开始意识到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了。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和其间的组织所构成的。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组织(而不是个人)是最基本的玩者(players)(姚洋,2002)。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因而,不无遗憾的是,无论是制度变迁理论,还是转轨经济学的研究,都忽略了组织及其扮演的角色。后面论述中指出,这一误解实际上已经阻碍了理论的发展。本文试图对此加以弥补。

政治域、社会域等因素对于组织和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

<sup>①</sup> 不仅如此,政治上也会引发冲突。目前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是化解冲突的一个对策。

响,中国 1978 年以来农业组织的演进即是对此结论的最好解释。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中的讨论长期以来局限于科层制和市场制度的两分法。但是,任何制度的产生都必然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和西欧的市场经济就不尽相同。可以想像,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会造就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新兴组织和制度形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中国改革实践对世界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因此,研究这些新兴组织和制度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性质和作用,是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领域中最令人兴奋的课题。例如,“公司+农户”作为中国特色的合同制度(contracting)在制度经济学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但这一制度在中国经济运作中的实际意义是否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吻合呢?如果有差异的话,是否可以在理论上提出一个满意的解释呢?它和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分包制(contracting-system)有何异同?再比如:中国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在当今中国扮演着何种角色?如何改革?当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它们和西方的合作社有何异同?对其效率有何影响?……如此富有意义的问题,比比皆是。

## 二、本文展开的逻辑和结构

### (一) 本文展开的逻辑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解释我国 1978 年以来农业经济组织演进的过程。整个研究的风格更接近于“新经济史”学派<sup>①</sup>,试图用理论去解释历史、在解释的过程中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果有可能的话,对现有的理论提出挑战、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历史演进的

<sup>①</sup> 新经济史学派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两人分享了 199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学派最新的一个论文集为 Dubark(2002)。

逻辑就是本文展开的逻辑。与之对照的是，“旧”的经济史学派，试图把经济史当作经济方面的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1978年之前，中国农业组织体系较为完整，各部门同属于行政体系，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协调。这套组织体系是我们研究的起点。1978年开始，各种各样的承包制开始推行，到了1983年，人民公社体制正式解体、退出历史舞台。随后，统派购制度解体，市场开始逐步发育壮大。遗憾的是，供销社、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乡镇企业（过去的社队企业）等并没有开始市场化的改革，它们仍然滞留在计划经济体系，没有足够的激励为农民提供服务，无法融入到新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当中。“统一经营”层次名存实亡。率先进入市场的、分散的、小规模农户难以获得产前、产后等各种服务，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户”和“高科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开始徘徊不前。

随后的组织演进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方面是滞留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各种组织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重新建立起和农民之间的联系，形成一套新的、面向市场的农业组织体系；另一方面是农民在旧有体系之外创办新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并通过和它们之间形成各种利益联结方式，形成一套完全不同的新的产业组织体系。两条道路，一个目的：适应市场经济。由此可见，组织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 （二）本文的逻辑结构

遵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首先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了1978年以来农业组织演进各阶段，以及各阶段出现的新兴组织形态。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难以回答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指出了理论发展的方向。

第一章致力于阐明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界定了农业组织的具体内涵，同时，也交代了本文研究的角度、研究的创

新和不足,以及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二章是理论综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和拓展,本章的综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对组织演进的研究;二是对中国农业组织研究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综述以诺斯(D. North)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为代表。对诺斯的综述试图说明组织和制度两个概念有何区别和可能代表着的两条不同的研究思路。综述威廉姆森的研究成果则因为他自称专门研究组织科学。对中国农业组织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的一批学者,包括黄宗智、林毅夫、周其仁、张晓山、苑鹏、杜吟棠等人。

第三章开始了以时间为主线索的分析,探究了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公社的解体——也就是承包制改革的推广——完全是农民和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博弈的结果。解体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贫困地区的创新,中央政府对此作出肯定并明确表态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承包制在其他相对富裕的地区推广。在第一阶段,首先是农民迫于生活压力,偏离原有结构;其次,是地方政府根据对中央政府态度的揣测进行决策;最后,是中央政府作出决断。在第二阶段,行动顺序相反,中央政府首先表态,地方政府听从,最后,是在农民当中推广。博弈的分析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第四章探究了市场的扩展和传统组织体系的解体。人民公社的解体代表着一个结构的解体,统派购制度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而言,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产品产量急速扩张,已经足以满足当时的需要,统购统销反而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中央政府的理性选择是放弃统购统销制度。政府的退出为农村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农户在获得自主经营权之后,开始生产新的品种,并开始相互之间的交换,交换在空间上的聚集促使了市场的形成。市场最初局限在各个封闭经济之中,它的扩展需要借助封闭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力量。我们详细探讨了各地政府之间的博弈如何推动了市场的扩展和分工的深化。在市场扩展的同时,为农民提供

服务、配套的产业组织体系却远未成熟。经济的转轨使得供销社、农业推广组织的功能定位已经变化,但是,它们却并未作出相应的调整。传统组织体系市场化进程的缓慢拖累了整个农业的发展,农业组织体系的创新势在必行。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新兴农业组织体系的剖析。第五章主要是针对各种各样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村经济联合体、社区合作经济组织,90年代之后出现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本文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当前制度环境下所催生的、也受到了制度环境的制约。通过适当的制度变革开放社员身份市场和取消分红的限制有助于缓解它所面临的融资、管理等方面的困难,通过维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性、依靠社会域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自身的优势和发展前途。本章的研究印证了本文的一个重要假设:制度的变迁推动了组织的演进。“市场+农户”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形式,我们把它放在本章作出了初步的分析。

第六章集中阐述与“公司+农户”有关的内容。我们首先探究了“公司+农户”这种组织形式目前发展的状况,之后,详细地探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公司+市场+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农户”。本章考证了各种组织形式得以产生的原因,探究了不同制度环境下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及其治理。研究结果显示,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适合于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如果不道明背后的结构,单纯对组织的效率进行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第七章对前面的内容进行了归纳,探讨了第四章提到的传统农业组织——供销社、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等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乡镇企业如何重新回归农业,传统组织体系如何与第五章、第六章提到的新兴组织的融合。本章以农业生产资料环节的产业重组为例,探讨了两套组织体系如何对接,最终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

第八章是本文最核心的部分,是本文分析的最终归宿。本文详细探讨了1978年以来农业经济组织的演进,它更多的不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证实,相反,而是某种程度上的证伪。本章提出了本文研究对制度经济学的三点启示:(1)演进在结构的各个层次上进行,而非局限于单项制度安排;(2)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制度并不是想像的那样自动朝着提高效率的方向演进;(3)单纯的效率标准难以解释制度的变迁。

为了行文的简洁和逻辑的流畅,我们把部分内容作为附录放在文章的最后。附录包括四个部分:附录一阐释了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附录二是古典经济学、管理学和老制度经济学对组织演进的研究,附录三是关于农民理性研究方面的一些争论,附录四揭示了制度变迁理论维持新古典理性假定带来的问题。这些内容对于理解本文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帮助。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农业经济组织的含义

本文以中国1978年以来农业经济组织的演进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内涵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农业经济组织容易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含义混淆。对于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含义,同样需要仔细的辨析。因此,有必要清楚地加以界定。本节准备首先界定农业的范围,然后,廓清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关联与区别,最后,对农业经济组织的具体内容作出阐释。

#### 一、农业:作为产业的含义

目前,农业产业链被行政权力所分割,相互之间难以协调,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也引发了食品安全性等问题。只有通过